

法国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母与子

(中)

[法] 罗曼·罗兰 著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母与子



李爱梅 程永然 译

(中)



modern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目 录

第三卷 母与子	(383)
第一部	(383)
第二部	(416)
第三部	(471)
第四部	(530)
第四卷 女信使(上)	(624)
一个世界的死亡	(624)
第一部	(624)
第二部	(705)

第三卷 母与子

第一部

战争不能把安乃德吓倒。她想：“所有的都是战争，戴假面具的战争……我一点儿也不会怕你把真面目露出来！”家里的人都和她一样，对战争的事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她自己最近经过了一次考验，并学会用宿命论来诠释一切：“我早有准备，即使天塌下来，我也不会害怕！”

西尔薇，她的妹妹，暗暗地在等待着战争爆发，她几乎要喊出声来：“终于盼到了！”

终于盼到了！无聊的日常生活扩大了。爱与恨的圈子也将要扩大……

她的儿子玛克极力想隐藏自己的热情，可是他发烫的双手和他的眼睛都出卖了他。悲剧性的理想终于出现了。他较弱，他一直在担心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出现。可是同时，他身上外人所不知道的朦胧的本能之声，在召唤埋藏在毫无意义的生活和令人讨厌的时代后面的那些疯狂的力量。他眼看比他大几岁的人纷纷入伍，他们心中充满行动和敢于牺牲的精神，这批人群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在泥沼中打滚。但在开始的若干天中，臭水仍然洁净，虽然这些小青年的灵魂已经被污染。玛克俯瞰川流，用舌头东舔舔西舔舔，舔舔自我牺牲的炽热的纯洁性，舔舔沉迹在底下的污泥。他既羡慕又担心这些青年将要面对的未来的战斗……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他刚好和母亲的视线接触了。俩人都把目光投向别处，互相逃避。母子二人心照不

宜。他们之间有足够的了解，却不想让对方更了解自己。可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同一片天下走。

只有一个人，他没有大伙儿那么兴奋。这人就是西薇尔的丈夫来沃保尔。全家老少中，该出征的就只有他一人。他盘算着：他的班级是在地方部队中最老的。因此不见得会立刻排到他。动员令是按照班次先后一批批执行的。他一点儿也不急。可是他心中升起一种预感，战争比他着急，战争忘不掉他。果然，战争超出他的预料，更快地想起了他。他是岗勃来地方的人，前线有他的岗位，人到了他的年龄，对于这种光荣早就没有兴趣了。可是在出发那天，他心情好极了。不过，那是不得已！西尔薇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知道，不用希望在别的女人们的眼中挂出一点儿对你怜悯的表情。每个妇女都有一个男人，丈夫，情人，儿子或是兄弟要入伍，他们大家一起走，给本来不寻常的事抹上了一层寻常的水粉。对于妇女们来说，如果其中一个男人反抗动员入伍，那倒是惹麻烦了。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沃保尔想也不想。他家里人态度坚决地同意他出征。而玛克这个小家伙却用狐疑的目光在一边窥探来沃保尔，看他会不会露出软弱的表情！在告别晚餐上，这善良的胖子和服装店的全体人员共同举杯，他要离开大家了，心头当然沉重。不过，对于他的利益，他可以放心，西尔薇会照顾好的。至于别的事，最好不去想它。在这种时候，西尔薇·吕克莱丝……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来沃保尔流着眼泪同她告别，泪水弄湿了她的脸颊。她说：“只当这是一次散步。多么美好的夏天！当心点儿，别伤风！”

安乃德亲了来沃保尔一下。（他也算揩了油了！）她可怜他，但却藏而不露，为的是不让对方心软。“可不是吗？虽然是这样……”来沃保尔的目光想要在这位大姐姐温柔的目光中看出什么，但除了坚定不移的“应该”外没有别的。

一堵墙。除了前进别无选择。

来沃保尔走了。

整座住宅楼像个蜂房，蜂群飞出蜂房，蜂房的每一格都要有所贡献。每一个人家都要有男子去牺牲。

最上层的阁楼是住着两个有老婆孩子的工人。在六楼，是那个三十五岁的单身汉，那个寡妇的儿子。和安乃德住在同一层楼上的

是一个刚结婚的银行职员。下一层楼住着法官的两个儿子。再下一层是法科教授的独生子。住在二楼的，是楼下开酒店的“布尼阿”的儿子。总共是八位士兵。他们都不是自愿去打仗的，但却没人管他们愿不愿意，现代国家使自由公民省了表白自己意愿的麻烦，公民们也认为这样很好，少操那份心！

从楼上到楼下，大家一致同意男人出征。只有一个人例外（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安乃德的邻居，那位刚结婚不久的沙陶奈夫人，可她太胆怯，无力抗议。

很少有人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全部自由和生存的权利，要让一个秘密的主宰者来掌握，任他宰割。只有少数几个人试图理解其中的道理。他们不需要了解就点头表示同意。他们是在对一切事情只要表示同意就可以了的情况下被教养大的。千万人都表示同意的事，也就不必管同意的理由了。只要互相看看，别人如何做，自己也跟着干就行了。精神和肉体的全部机构能自由支配，不必费力。天啊！把羊群赶向集市多么省事！只要有一个目光短浅的牧羊人和几只牧羊犬就行，牲口越多，反而越驯顺，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个体融合在整体之中。一国人民是一摊凝结的血液……直到发生巨变的生死关头，到那时人民与季节就按时更新自己，于是江河解冻，冲破巨大的冰层，河水泛滥，夹着泥沙顺流直下，毁掉城乡，覆盖原野。

全楼的住户各不相同。他们的信仰、传统、气质，都不一样。每一个这样的灵魂细胞，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方式。但忍气吞声则是大家共有的。

他们大家都爱自己的儿子。和十分之九的法国家庭一样，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从一进入生活，从二十五或三十岁开始，就用日复一日的默默的奉献为代价，给他们的儿子创造条件，希望儿子能够得到他们自己所得不到的欢乐，能够实现他们没有实现的雄心壮志。但是，动员令一来，他们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了出去，交给国家毫无怨言……

六楼上的老寡妇卡尤太太，已经是花甲年龄。她丈夫死时她才三十三岁，儿子八九岁。从那时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大约有十年光景，两个人没有一天不在同一屋里度过。人们差不多把他们看做一对老夫妻。因为艾克多，卡尤的儿子虽然不到四十岁，

却有退休的老公务员的神情。他的生活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他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获得别的命运。

父亲生前是个邮局职员。现在到了儿子这代也是个邮局职员，一代接一代，停滞不前，没有前进。可是你知道，往往要花多大努力作为代价，才能保持原位。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权力，不想输，就只有赢。

母亲生活没着落，还要抚养孩子，只有靠打短工。曾经有过自己的温暖的小资产者家庭的人，过这种雇佣生活是很痛苦的。她却不怨天尤人。现如今母子二人总算再度上升到曾经失去的卑微的天堂里。她以操劳作为休息，这是为她自己和儿子劳作。她有了自己的家，儿子的家。她有一副贝里地区人善良而厚道的脸庞，头戴一顶多褶皱的白布便帽，比星期日扣在自己灰白头发上的太太们戴的那种要合适得多，她的没有牙的大嘴从不高声讲话，但是对她的儿子和熟人，微笑总是被挂在嘴边。她稍有点儿驼背。早上她第一个起床，把咖啡牛奶送到儿子床上。白天儿子上班，她在家仔细打扫房子。她是烹调能手，给儿子准备膳食，儿子吃惯了由她做出来的美味佳肴。晚上，儿子把白天听到的话说给她听。她不是很专心，但只要儿子在讲，她就感到幸福。每逢星期天，早上她到教堂听弥撒。儿子不去。这是早安排好了的，并不是他不相信别人的话，而是他没有信仰。宗教是妇女的事。她一个人替两个人信教就够了。礼拜天午后，母子二人一起去散步。他们极少离开本区街道。他还不到老的年龄却已经成老人了。母子二人习惯于享受一点儿不必多花费的舒服生活。两个人结合得如此亲密，以至于儿子一直没有结婚，也不想结婚，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他没有朋友，没有女人，几乎不看书，但不感到沉闷。他每天读同一份报。父亲在世时就看这份报，这份报的观点也变了很多次，可他却始终不变：他的意见永远和他所看到的报纸一致，他没有什么好奇心，他的生活是机械的。母子间生活最美好的部分是他们的枯燥的谈话，或者默默地让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循规蹈矩。他们之间除了亲密相处之外，少有激情，这是他们宝贵的习惯，但愿这种习惯不受任何干扰！尽可能不做改动，尽可能不去考虑。两个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但是连这点儿起码的奢望也不能得到满足！战争，动员令，将母

子分开。母亲叹气着，匆匆忙忙替儿子收拾行李。他们不抗议。最强有力的人总是有理由的。强大的力量不可更改。

卡尤母子住在比安乃德高一层的楼上。在安乃德楼下住着贝纳丹一家子，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是天主教徒，保王党人，祖籍在法国南部的阿基坦。

父亲是法官，身材矮小，粗壮结实，像野猪一样，身上毛厚，短须浓密，几乎掩盖了面部。他血气旺盛，闷着一肚子火气，易冲动。他出身于农民，性格开朗，城市生活让他窒息，闷得他快要爆炸了。他讲究饮食，像高卢人一样开怀大笑。稍不称心，这短粗的老家伙就大皱眉头。怒火勃发时，他头往前拱，双足乱踢，来势凶猛，但霎时就过去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职责和宗教信仰，不得不突然压制怒火。他克制自己，态度忽然变得平易近人。

他的小儿子二十二岁，刚刚考入夏特文献学院。他留着尖尖的山羊胡须，一脸皮笑肉不笑，眼光低垂，目光呆滞，近乎十六世纪末的风范。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却偏偏要学艾佩农班子中的小白脸那种狡猾神情。另外一个儿子二十八岁，面孔丰满，胡子干净，头发顺滑地梳向脑后，厚厚的头发包着脑壳，波浪形的发卷，这是贝里埃式的发型。作为律师，它在“卡默路”案件中开始闻名于世。一旦国王复辟成功，他就是司法大臣。

三个妇女，母亲和两个女儿，只在第二线活动（后来安乃德也和她们熟识了。），她们不抛头露面，几乎不看书，很少出门，从来不到剧院，但经常去教堂。她们把时间用在慈善事业上。

三个男子受过严格扎实的古典教育：“罗马，惟一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用拉丁语要比用英语或德语在国外问路省事得多。他们不屑说英语或德语。应该叫北方的野蛮的民族来学习我们的语言。他们在古老的理想之中活着。这些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不掩盖地赞美莫拉斯的异教思想。莫拉斯这个了不起的罗马人！他们三个人性格都较快活，乐于生活。三个人在一块儿，没有妇女在场时，也讲一些风流故事解闷。全家六口一起去听弥撒，这是一种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场面。他们的视野是狭窄的，可是整洁明晰，像法国的风景，轮廓清楚均匀。若干世纪以来，丘陵环绕着古旧的小城，巴黎的教区等于外省的一个城市。对于围墙外的一切，人们并无

恶意,只不过有点儿讽刺的嘲弄意味。可是并非对城外的一切有所了解。人们对此无从知晓,只是为了小小的城市而生活。在头上,有上帝,有一片蓝天,还有圣苏尔庇斯教堂白色钟塔上响亮的钟声。

可是,当共和国政府来要这两个儿子,打算用他们的肉体去挡敌人的机枪时,两个人谁也不表示反对。这一家六口人心中难过,但不表露。他们知道,属于凯撒的一切一定要还给凯撒。上帝并不苛求,上帝只要人们的灵魂,他可以不要人们的肉体。他甚至不说有权干涉人们的行动,只要有意愿就行。凯撒利用这一点,把一切拿走了。

三楼的纪莱先生是法学教授,他丧偶好几年了,现在跟儿子住在一起。他也是法国南方人,但是不同的南方。他是赛维纳地方的新教徒,自以为是“自由思想者”(我们大学界的方帽学士们,大家都认为是“自由思想者”)。在心灵深处,他是“巴尔巴友”。贝纳丹家的每个儿子可能这样说他(实际上是这样说的),他们在家讥笑他缩头缩脑的样子,和他那副海军上将的宣教者的面孔。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对自己应尽的职责是谨慎的,满脑子是道德上的成见(最坏的成见,因为不留情面)。

纪莱教授对楼上贝纳丹家特别重视,对他们一直礼貌周到,尽管显得有些僵硬。可是实际上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如何看待他,他就如何看待他们。虽然他的诚意是要做到中庸,但他总觉得天主教是一种缺陷,一种落入俗套的陈规。哪怕是最诚实的人,不论他们做些什么,也总要留下这种毛病的迹象。他毫无疑问地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拉丁民族衰败的原因。然而他是个小心谨慎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避免头脑发热,即使要担枯燥乏味之讥的风险也毫不怜惜。他用单调的鼻音读着材料丰富、引证广博、诠释详细的讲义,是再枯燥乏味不过了。他的史学评论被他的先见之明所扭曲,他自己不知道,甚至从没注意,是因为在他看来,不成问题的是他的先见之明;同时也使他受到缺乏可塑造的影响,因为他不能适应各种思潮。这是个读书破万卷的人。他在书籍中见识过很多在生活中也不少见的一些事,可是在他花白头发的脑子里,却保留着可笑、令人感动同时也是可怕的原始的幼稚,从而使他有了种种狂热的信仰。他有很高的道德意识,十分贫薄的心理意识。凡是与他不一样的人,他都理解不了。

他的儿子和他一样。他是巴黎大学年轻的博士,年方三十,刚刚通过一篇出色的论文答辩。这位史学家戴着思想的眼镜看世界。不用说,都是他自己头脑里的思想。他的眼镜片的厚度似乎要验光技师来校正。他一直不曾想过这一点。与他父亲一样,对他来说,凡事“一开头”不是事实,“一开头”就是原则。共和国是原则。第一次革命的各方面的克服,都和定律相似。不言而喻,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是为了使这一切得到证明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场战争应该在世界上建立起民主与和平。他们不想一想:如果把保卫和平作为开端,那不是更明智些吗!可是他们毫无疑问,破坏和平的是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他们不接受也不正视真理。为了全世界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让他们正视和接受真理。

父子二人看起来像哥哥和弟弟。俩人长得酷似,而且相亲相爱。他们都一样强壮、挺拔、气宇昂扬。他们在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下过日子。不容许一切疑问侵入这件外衣,哪怕只有一指的深度。他们的学问是忠诚地为他们的民主信仰效劳的,而他们却不曾意识到。他们的意识代表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即使在受火刑时,他们也不会丢弃信仰。(儿子将要受火刑,在战壕中!父亲知道儿子将要受刑而心如火焚,好似和儿子一同受刑。)他们深信不疑……而他们却标榜自由思想!……

年轻的纪莱是丽蒂亚·莫里西埃的未婚夫。丽蒂亚是日内瓦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长得讨人喜欢,人也勤劳利索。她被这个小伙子迷上了,小伙子也忠诚地爱着她。丽蒂亚的爱情不带宗教色彩,而是世俗的。可是为了配合未婚夫的爱情,她也极力使自己的爱情带上宗教色彩,连她的带着笑意的蓝眼睛也因此变得严肃起来。在天性深处,丽蒂亚终究是世俗的。她的天性要求于生活的只是自然的幸福、大地、空气和水。一年四季,她所希望的是健康、阳光和爱人的爱。如果这个被她热爱的人到生活之外,到意念中去寻找生活的幸福,那么她也会同他一起去意念中寻找幸福。这个年轻的瑞士姑娘驯服地把法国共和元年和武装人权等法国共和的经典,也就是她未婚夫的信仰,背得纯熟。如果她就一个人,当各国争吵时她决不会偏向任何一方。呵,如果她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她就要马上把未婚夫搂在怀中,躲得远远的!这战争带给她多么大的压抑!战争距离

她的思想多么遥远！可是她责怪自己抱有这种想法，既然她心上人不这样看待，不这样判断。她软弱，她错了。为了让自己问心无愧，她应该闭上自己的眼睛，用他的眼来代替她看事物。呵，我的爱，只要你相信，我也情愿相信。我相信！

在这幢大楼上，只有一个人拒绝相信，她是克拉丽丝·沙陶奈，安乃德同一层楼上的邻居。不，不，她可不是那种肯牺牲自己爱情的人，再说那也不是真正的爱情。她的丈夫本来就没有信仰。他只有对他人的尊敬，对舆论的畏惧。他是银行职员，碌碌无为，平易近人。他仪表堂堂，留着金黄色的稀少的八字须，只是蓝色的眼珠有点儿无神。世上的事物：银行、政治、说实话连祖国包括在内都不是他所关心的。在他眼中，这位他三个月前娶到手的心上人是世界上惟一值得他关心的。多么热烈的三个月！他们仍然没有过够。在他们相互拥抱着追忆往事的夜晚，他们的手在颤抖。这个热情洋溢的女人，紧紧地抱着她的丈夫。她是巴黎的一个小小女工。她像崇拜神灵一样爱她的丈夫，一个属于她的神灵，她的宝贝，她的玩物，她的猫，她亲热的小动物，她的灵魂（如果她有的话），她的内脏，她的所有，她的一切！……她是一个瘦弱的黑发女人，身体弱小，脾气急暴，浓密的眉毛，细心地抹得更红的嘴唇犹如白面孔上的一道红线。她的热血被情欲吸干了。他柔顺地让她爱着，毫无疑问，他听凭这个女人强烈的热情摆布，两个人轮流充当对方的吞噬物，谁都不想结束这种游戏。生命没有其他的意义……

但是，战争一旦找到他，他就立刻挺身而出，不说一个“不”字。这显然不是高兴的事，因为不很勇敢，他想起快要离开的一切和以后经受的种种，他简直想哭，同时又担心露出弱点让人讥笑和蔑视：过分儿女情深，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她心里很明白，向他喊着：“胆小鬼！胆小鬼！”哽咽着哭起来。

他恼了，冷笑着反驳道：“胆小鬼，说得好！说真的，想当英雄好汉的人才是真的懦夫！为祖国牺牲！……”她央求他不要说下去。一提“死”字就使她魂飞魄散。她让他谅解。他却徒然露出一副爱国主义的样子，只是给自己打打气而已。她不敢再反抗。她太孤独了，不愿向人诉说衷肠。全世界的人（这算不了什么！）和他（这才是一切！）都会骂她是歪门邪道。但是她心里明白，他在背地里，偷偷地与

她想得一样，他是个不幸的人！“为祖国而死！”不，不，实际上是为看戏的观众而死！男人们是软弱的，他们没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快乐。不幸的人们！不幸的人们！她擦干泪水。她是在演戏，应该摆出一副笑脸。既然他让她演下去，那就到后台再哭吧。“对，你也如此，你骗不了我。你同我一样，痛苦，绝望。呵，胆小鬼，懦夫，为什么你要走？”

他完全明白为什么她这么想，他脱口而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那我该怎么办？”

但是她是个女人，充满激情的女人。她不理解，不理解什么阻碍她：“该怎么办？应该留下来不走！”

他耸耸肩，唉声叹气。

呵，全世界都反对她！……也反对他。但使她怨恨的惟一的人是他！他认为世人有理。他低头服从。为什么？……

顶楼上住的两个人，佩莱（马鞍和皮革制品工人）和佩尔吉埃（电器装配工），也在低头服从。他们原来想起来反抗，但是既然不能反抗只有跟着走，别无选择。两个人都是社会党人，有相同的信仰作为出发点。可是，在同一出发点之后，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现如今他们不在同一阶段上。

一个星期以前，佩莱还钢铁般坚信不会再打仗了：“所有的都是报纸上的无聊闲扯，是那些围着绿色围裙坐在那里打扑克的家伙、部长们和外交家开玩笑的话。再者，要是这伙出卖人民的贩子跟我们瞎捣乱，我们会让他们老实起来。毕竟还有我们在这儿，我们是工人国际的，饶莱士、瓦扬、盖斯德、勒诺代尔、维维亚尼，以及一切别的工会，都是钢铁联队；加上城墙那边所有的同志，德国的同志们……你听我讲，佩尔吉埃！最近几天，我们（我们的人）和他已经接上头了，所有的都组织起来，并宣布了口号，如果那些家伙要冒险下动员令，那将是我们下动员令，我们不会让人家管这件事。”

但是佩尔吉埃笑了一下，头也不回吹了声口哨。接着，他满是胡须的嘴说道：“你还年轻，同志！”

佩莱恼了。他已经三十七岁！而且度过了艰苦的三十七年，足够抵得上那些温饱终日、闲着无事的人五十岁！可是佩尔吉埃悠闲地说：“原因正是这样！你过度操劳了，你没有空闲思想。”

佩莱抗议这种想法。他拿出刚看过的当天报纸上新出台的评论给佩尔吉埃读，这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说话的惟一报纸。佩尔吉埃耸耸肩头，厌烦地说：“他们就会空说，真让他们干就不同了。他们会全藏起来。”

他们全“溜走”了。饶莱士像一头公牛似的被一个躲在窗户后面的无耻的“斗牛士”开枪打死了，沉浸在痛苦中的巴黎街头，出现了漫长的游行示威队伍。那是一个悲惨、哀怨的大集合。演讲，演讲，一阵阵暴雨似的演说，对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有那么多话要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在悼念死者，又有人说：“他还是躺在棺材里更舒服些……”

人民群众在等着报仇的说词：可以打破焦急不安的僵局的口令，黑暗中的光点。在送葬者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中，只有对于亡者说些背信弃义的话。他们说：“我们起誓，一定要报杀饶莱士之仇！”信誓旦旦，话音未落，他们已经把饶莱士出卖了。他们自己成了战争物资的供给者，而饶莱士正是被好战分子迫害的。他们对民众说：“你们都去厮杀吧！我们要在死难的兄弟们的遗体上，结成神圣的联盟！”

在德国，人们也在说着同样的话。

人民沉默了，大家不知该往哪儿去。静默了一会儿之后，人们开始大声疾呼，他们跟着旁人跑着。让他们自己辨别正误，不可能。既然替他们辨别正误的人，他们的向导，带领他们走向战争，所以就不去不行。现在佩莱深信他是去为人民服务的，为工人国际服务。战争结束之后，会出现黄金时代……反正要给自己吞服的药丸上抹一层金色！

但是佩尔吉埃不信这一招。他说：“瞧瞧，他们来不来！人们的事业，我可见得不少。我要努力替我自己的事业效力。总之要像他们那样干（他想起那些抛弃他不管的社会党大鲨鱼们），要适应……”

佩尔吉埃是能适应的……

从上到下，整座住宅楼中，人们的意识并无暴烈的表示。人们咒骂德国人是侵略者（他们是反侵略者，不言而喻，这是毫无辩论余地的。）。谁也不想打仗，但是大家都得去，坚决要教训一下德国人。他们咬着牙意识到，必须牺牲。从默默地蜷缩着的痛苦的心灵深处，死

亡的意念唤起了热情。但是，仇恨却没产生出来。

也许只有楼下的“木柴商与酒店”老板拉乌沙(奴玛)身上有点儿仇怨的痕迹。这个袒胸凸肚的肥胖家伙，拖着一双患风湿病的脚，一边谩骂，一边讲了很多有关德国人的坏话。他佩服他的儿子格罗维斯要去刺穿那些德国佬，那些“香肠”的大肚子。那小伙子非常高兴：去玩一趟！到了那边，他要痛饮德国啤酒，认识认识德国大姑娘。大家大笑大吼……可是，胖子，我看你心神不定，你想用大叫大吼来遮掩你的不安。我看出你所以恼怒，是因为不得不送你的独生子去冒险……“万一他们，他娘的，把我的儿子给毁了！……”

这都无多大关系！总而言之，这座大楼上的气氛是庄严肃穆的，没有狂野，没有懦弱，充满宗教式的，男子气的逆来顺受的神气。大家表露出他们的自信。像一张绷紧的弓，对着素不相识的上帝，大家把不安的情绪隐藏在心中，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我是不是各处都看过了？我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有把谁漏掉吧？

呵，可不，忘了一个！忘了六楼上那个住在卡尤家旁边的年轻作家约瑟凡·克拉比埃。他二十九岁，有心脏病，不用服军役。他的本能让他最好不要抛头露面，所以他很少出门。在目前，大家怜悯他。但这可是一笔欠款，为小心起见，还是不能乱用。克拉比埃是细心的。他的良心却不平静……在楼下，还有一双眼睛，勃洛雄的眼睛。对于勃洛雄就不用细说了。但是，从那里经过而不想看见他，那是不容易的。他是看门老太太的丈夫，是个警察。这个人不服军役，因为后方需要他用眼睛和拳头。他的责任是留下来。因此，他更可以说是一个战斗员。他监视可疑分子，监视后方的敌人。他用慈祥的眼光，关切地望着这座居民大楼。这座楼气派刚直，给他增光彩。他对大楼上的居民们有特殊的容纳精神。可是不管怎样，责任高于一切！他在注意克拉比埃，此人是个维和主义者。

这回真是毫无遗漏了。我把一条楼内的狗作为我检阅全楼的最后一个分子。我除了二层楼到处都去过了。二楼上了锁。这是一个神圣地区，房东自己住在里面。波尼翁先生和太太有很多钱，岁数大了，闷得受不了，出去度假了。七月份他们收过房租，十月里才回来。又一个季度快要过去了……

在这段日子,上百万人将要命丧战场。

八位战士都已经出发。留在家里的人屏息静听他们慢慢远走的步伐声。街上热闹的很。可是在家里,特别是夜间,一种悲剧的静寂,在人们心头压着。

安乃德平静的很。但是她这种平静是不值得称道的,因为她不用冒任何风险。她心里明白,而且有些愧疚。如果她是男人,不用问,她也要走,毫不犹豫。如果她的儿子比现在大五岁,她仍那么果断吗?谁知道?她也许认为存有这样的念头对她是一种侮辱。她自己生气,气得额头都红了。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恨不得把她所爱的一切,连同自己在内全部投入赌局……她后悔了吗?对,也许如此,但是,把儿子也投进去?是吗?她有把握吗?让我们假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有人揭穿她的假意,她会像愤怒的朱诺一样,皱起眉头。可是,当那个小男孩从她身边走过,她努力控制自己才不会把孩子紧紧抱入怀中。孩子进了她的怀抱,她不会放手。

即使在她的天性中有可能采取若干行动,她也仍无需行动。她(她和她的儿子)在目前平安无事。命运给她观察的时间。她要利用这次机会,她有自由的眼光。没有任何意念使她受到干扰。直到那时,她从不过问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将近十五年来,她完全忙于解决最紧要的矛盾:为面包的战斗;也为解决最尖厉的矛盾:自己与自己斗争。那才是真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每日进行,她认为的片刻休息,只不过是空话。至于外界的战争,各国政府的决策,则和安乃德毫无关系。第三共和国,或不如说……(因为这个无能为力的政府全部和它的手——那个夸夸其谈的皇帝一样,当它说“是”的时候,心中却是个“不”,交织地宣传干燥的炮火,或枯了的橄榄。)不能说在已经有四十年之久(正是安乃德的橄榄。)的欧洲没好运气享受。一种不受干扰的和平期间,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看见的战争只是遥远的、模糊的印象,以布景和意念的形式出现的浪漫派的场景,或者只有道德与玄学的诡辩题材。

安乃德曾经漫不经心地接受官方充分的教育,那时还不被相对论所动摇一切。她习惯于接受所有现有的东西,像各种现象都有它们的规律一样,她受某种规则制约,形成后就很难改变。战争是自然规律的一方面。在安乃德的想法里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反对或是不

承认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不在心的范围之内,也不在理智范围之内。但是它们掌握心也掌握理智,人们不得不接受它们。安乃德接受战争,正像她愿意死去,接受生命一样。人们从自然方面接受下来的各种必须的东西之中,包含生命的谜一样的野蛮本性,战争并不一定是其中最荒诞最无情的一类。

对于祖国,安乃德毫无特殊情感。她既不热烈也没有成为什么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她不会为了假装,也不会为了钻研而记起她对祖国的情。祖国也同样是一种现实的事实。

战争好似一把锤子,刚刚敲在钟上,表示开场了。在这战争开始不久的时辰,安乃德觉得她有很大一部分——像一个深沉的昏睡中的行省——苏醒过来。她的第一印象是因此而自己增大了。以前她被囚禁在个人主义的牢笼里,现如今她挣扎出来了,展开她的四肢,从独立的睡眠中清醒过来。她和人民合二为一……

人民的一切活动,在她身上反映出来。一开始,她已模糊地认识到,朱诺神庙的一扇门,她心灵的一扇平常紧关的大门,这时被打开了!……揭开了面目的本性,赤裸裸地显示出力量……她会看到什么?谁会涌现出来?不管如何,她都做好了准备,她等候着,她现在是恰到好处了。

她周围的大多数人不适应这种炽热的生活,她们在发酵。八月里的第一个星期还没过完,她们却已经在发热了。热病侵蚀那些毫无抵抗力的机体,毒性极强的瘟疫菌使污染了的血液突然冒上来,使皮肤出现斑点。病人们默默无语,忧忧虑虑。他们待在房子里不出来。疾病的爆发正在形成之中。

安乃德很平静。在同一社会环境的人之间,只有她一个人不慌不忙,可以说是“正常化”了。说起来很可怕:她现在呼吸很舒心。无疑地问她很像“大入侵”时代的高卢妇女,她的祖先们:当敌人的浪潮涌向他们游牧的村庄的栅栏时,她们登上牛车,去投入抗敌斗争。坦荡的草原,大风拂动她们袒露的胸脯,她们呼吸得更舒适。而对着斗争和冲上来的敌人的浪潮,她们的心脏平缓地、自如地跳动着。她们遥望远处被践踏的田野,上面有她们车轮的轧痕;眺望葱葱郁郁的森林和丘陵蜿蜒的地平线,自由天宇在等待自由的灵魂。

安乃德在牛车上眺望,她承认:“是如此的。”……

正如印度人说过：“这就是你，我的孩子。”

世界范围内充满了侵略的灵魂。安乃德在其中认出了自己……这些发热的灵魂是我……这些深藏的力量，这些赤裸裸的恶魔，这些牺牲，这些悲惨行为，这些激情，这些暴力……是我；这些将从深渊中涌出的神圣而被咒骂的强大力量，是我……

别人身上有的一切，我也有，以前的我隐藏着，现在我暴露自己。以前我不过是现在的我的影子。直到现在，我生活在白日梦中，可是现实却存在于我的被压抑的梦中，现实在我面前！世界在战争中……我……

如何用语言来表达所无法表达的一切？如何表达像酿酒槽中膨胀起来的葡萄汁一样的、这个狂醉女神灵魂深处的沉默的幻想？她在观察，在用鼻子嗅这种不断上升的沸腾翻滚的浪潮……这种悄悄的昏眩……一场可怕的悲剧正在演出，安乃德是演员之一。但是没到她出场的时间。她已经准备好，但还未卷入行动，她还可以静观其变。她在这可贵的片刻深呼吸。她俯身在洪流之上，她的目光沉入水中，可是仍坚持留在岸上等待有人对她说：“该你了！是你跳下去的时候了！”

急流猛涨，声响轰隆，河堤决口，洪水泛滥……军队溃败，人民受到屠戮，城市毁于一旦。在十五天时间里，西方世界倒退了十五个世纪。眼下，如古代一样，成群结队的人民，被逼得背井离乡，为了逃避侵略者的迫害，四处流亡……

从北方逃来的川流不息的难民，好似一片粉尘纷纷飘荡在巴黎，预示着火山爆发的熔浆就要跟着来了。一天连一天，巴黎的北方火车站像阴沟一样，不断向外涌着污水。一批一批的难民，浑身脏臭，狼狈不堪，都挤在斯特拉斯堡广场附近。

没事可干的安乃德，急切地需要消费她毫无用武之地的浑身的力量。她从羊群似的人群中穿行。这些人被高声的叫喊和互相的撞击摇撼的精疲力竭。愤慨的安乃德心跳加速。在这一大堆不知名姓的不幸人群中，她不知所措。她要抓住一个人，让她近视的眼光有所注视，她乐于助人的热情有施展的对象。

她刚一进车站大厅，就在墙边两根柱子间的空地里挑选，本能地挑了一对难民。一个男子地上躺着，一女子坐在旁边，把他的脑袋放